

新中國與香港的關係

及其對教會的影響

任致遠著
劉賽眉譯

在最近發生的種種事件中，毛澤東之死（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以及四人幫的被捕（一九七六年十月）對香港的影響不輕。自從這些事發生以後，大陸開始了自一九四九年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門戶開放和自由化。這些變動實際上影響了香港的生活和各方面的活動，譬如：在香港和大陸之間加強了經濟、文化、貿易、和體育上之來往；往中國大陸去旅遊和觀光的香港居民日益增多。這種新的現況帶來了許多不同的後果，本文實在無法一一枚舉。最近兩年，雖然中國仍未確定其自由化的政策應實施到何種程度，但其後果到今日還繼續發展下去。

本文無意去分析這些新關係在經濟及政治上所引起之反響，而旨在探討：自從這位「偉大的舵手」去世後，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產生了什麼變化。本文的第二部份會研究在這段期間教會所受到的影響。基督徒的團體既是活在世界之中，故此，社會問題不會與它毫不相干。這類問題能夠刺激它反省。既然教會被召成爲麵團中的酵母，其生活的真實與否就有賴於它如何在福音的光照之下，去聆聽和分析周圍環境的事實，並以慷慨的態度去答覆。

第一部份

〈一〉中國臨在於香港

首先，讓我們看看門戶開放後的消極效果之一：就是非法入境者的問題。香港政府對這些非法入境者，態度相當強硬。這並非全是殖民地政府的獨斷獨行，而是來自香港廣大市民的意願。教會對此感到束手無策，只好緘默不言。稍後，我們會再探討這個問題。

有關新界的租約問題，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條約註明：「一切中國人有權進入、居留，和離去。」大批的難民潮不斷地湧入香港是一個歷史的事實。香港一向都是中國內地人民的避難所。這些人雖然出身卑微，但其中有些竟成爲了香港的富豪和縉紳。這一批靈巧、純良的勞工，藉其勤懇的勞動曾開發了香港，使香港的發展成爲奇跡。可是，今日的大陸難民，情形則今非昔比，他們成了香港未來發展的威脅。若收容這一大批難民，則會嚴重地增加了這塊殖民地的經濟負擔，且使到香港的居住和交通問題更爲惡劣。人口過盛的情形已相當駭人

，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前任港督麥理浩曾於一九七九及一九八〇年前往中國，意圖解決這個威脅香港安定的嚴重問題。數次會談之後，結果雙方政府都強硬執行某些措施，以阻止難民狂潮的再度泛濫。（註一）雖然如此，許多大陸居民仍設法潛入這塊英國屬地，企望定居。非法入境者數目的下降說明了官方的限制生效，但這些數字不可視作完全可靠的證據。（統計的數字似乎與事實不符，但無論如何，它是目前發表的唯一根據）

一九八〇年九月（在嚴格限制非法入境者之前）：每日在新界被捕的非法入境者有四百五十人。（註二）

一九八一年（在實施限制之後）：平均每日被捕的人數爲二十一人。（對於那些偷偷越過警網而潛入境內的，則無法有確實的統計數字）

至於北京條約，現在已沒有人會再去談論它。由於經濟上的利益，港府不會去談及它；香港的居民亦不會，因爲他們愈來愈不歡迎那些新的移民。至於香港的居民本身，如果說其中隱藏着種族歧視亦不爲過份，因爲有些人把這殖民地的一切社會流弊都歸咎於那些非法入境者。香港人聽到一九八〇年的管制消息時，都感到滿意，但這種表現並不太健康。五十年代的難民很明顯是忘記了自己當日的遭遇！他們的反應是否只是表示自己已在社會上獲得了一席之地的人，現在不願與他人分享？在中國與香港之間，存在着很深的鴻溝。本文的第一部份就是要探討這一點。

〈二〉從香港湧向中國的人潮：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並未完全中斷。但這關係隨着大陸政治氣候之變遷而時好時壞。雙方的來往異常小心，而且許多時是建基在意識型態的相容上。只有少數的香港人能夠進入大陸，並且受到諸般限制。自從鄧小平重操政權，各種障礙逐漸一一除去。今日，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進入中國。他們可以接觸到那裡的民衆。最近幾年，到中國旅遊的人數直線上升，甚至成爲一股熱潮。（註三）

這些旅遊所帶來的直接效果之一，就是刺激起人對中國的各方面產生興趣。大眾傳播媒介製作了許多關於中國的節目，而這些節目的質素亦不斷提高。好幾份專門論到中國的雜誌已經發行（註四），各個電視台創作引人入勝的節目以與這些刊物分庭抗禮。中國實在吸引了不少人！

親人終於能夠相聚，久別重逢的事件特別感人肺腑。以前只能夠在信中含糊地報導的事情，現在都可以面對面坦誠地交談了。可是，就如所預料的，在初次充滿感情的相會以後，困難立刻隨之出現，原來兩地之間的鴻溝是這麼大！

從一開始，兩地的經濟觀點就有很顯著的差別。香港的經濟發展神速，雖然不正義的社會現象比比皆是，但大部份的家庭都可以有相當程度的物質享受。在香港，電視機、電話、電冰箱是很普通的消費品；但在中國這一切却不易得到。在香港能夠有的娛樂，在中國則罕見。香港的工人所得之收入比廣州高出五倍（但廣州某些用品的價格也較低廉）。這種差距很快便產生了反應。殖民地的安逸生活被刻劃得繪聲繪色，使大陸的居民傾慕不已。當聽到

居於殖民地的同胞談論「的士高」(Disco)及日本新出產的靈巧電器時，他們感到十分氣餒。香港人在有意無意之間表現出一種優越的態度，這種態度很快便給大陸的同胞覺察到。爲此，他們要求其親友於下次探親時，給他們帶些這類物品來，好像這些東西能夠賜予他們幸福似的。到中國去旅行和探親因而變成一項沈重的負荷。無論在機場、火車站、和碼頭，都可以看見遊客携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往中國去。衣服、食物、收音機、錄音機等等魚貫入境，有時甚至以非法的途徑進入。按估計，在一九七九年一年內，藉旅遊探親而帶入中國國境的電視機，超過二十萬部。(註五)這小小的螢光幕已深深地吸引了中國的南方，成千上萬的觀眾醉心於欣賞香港電視台所播送的美國長片及日本連篇劇集。在筆者最近一次的廣州之行中，親身體會到電視對人民公社影響之大。許多屋頂上裝置了電視的天綫(一般稱之爲「魚骨」)，人們對時下流行的節目津津樂道!(註六)

當餽贈禮物給親友時，往往會引起衝突和誤解。一方面，在中國，人們變得愈來愈多要求；既然認爲香港人生活得如此豐盛，他們不了解爲何他們的親友不可多給一些。另一方面，居於香港的人們，感到大陸的親友不了解他們所贈禮物的價值，往往得寸進尺。大陸的居民既然逐漸形成了「接受」的心態，人際關係於是變得不真實。

其實，在人際的來往中尚有更深一層的困難：昔日在五十年代亦是鄉下人的難民，今日成爲了繁榮都市的居民。他們的子女接受了中小學的教育。香港的確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城市，它引進了美國紐約和日本東京的先進科技和製作方法。然而，中國的鄉村仍然相當傳統和保守，縱然是大城市，其發展方式亦與世界各地有一段距離。在香港，思想和行動都很自由，但在中國則不然。這一切均影響着兩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隔閡遂又出現。香港的居民感到自己較爲優越，因爲他們有機會接受高等的教育，他們的生活由於現代科技的發達而及於國際水準。中國的居民很容易會覺得來自殖民地香港的訪客瞧不起他們，認爲他們落後。他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既抱怨這些訪客，另一方面又嫉羨這些訪客的生活方式。香港宛如一位極具魅力的愛人，吸引着某些中國青年，使他們難以抗拒地以香港爲文化的模式。(註七)

〈三〉香港的政治良知：

香港人常常被形容爲不管政治者，其實，他們很了解自己所拒絕的是什麼，只是他們不知道自己企望的是什麼罷了。他們所要的「既非共產黨，亦非國民黨，更非英國政府。」今日，這個社會主義巨人的改變影響了香港人在心態上的演進。紅衛兵的時代已成過去(這是意識型態到達白熱化的階段)，盼望歷史不會重演。那些忠於毛澤東思想及其教義的信徒，其信念已產生動搖。美國和日本從前是中國的敵人，現在已握手言和，日本更被視爲中國的盟友。文化大革命的犧牲者於數年前已獲平反，其權力目前亦頗鞏固。雖然最近仍出版毛澤東的作品，但這顆東方的明星已失去光輝，「毛語錄」逐漸被廢棄。由於這種種事情的發生，使到香港部份支持北京政府的人也改變了他們的看法。一小撮誓死忠於革命的人士有些沮喪，同時，以前目睹着中國因某些人狐假虎威而被弄得一團糟的老百姓，現在開始重新發現中國的本來面目。他們所真正期望的究竟是什麼？

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年間，一如其他地方，香港也廣泛地應用「正常化」一詞來描繪最近中國的演變。這詞的意義十分含糊，它可以是指：(1)中國已趨成熟，不再濫用文化大革命，而採取一種「自由」的政策，此政策以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的政策為標準。但它亦可以是指：(2)以西方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為標準，強調人與人、國與國、以及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不少人對正在尋求另闢途徑的中國感到擔憂。中國變得聰明了些，現在頗為隨大流，投入消費社會之中，因此，世界各國對它亦恢復信心。中國的行動和態度再度表現正常，因為它更接近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互相角逐與競爭。倘若「正常化」是指這種情況的話，則其性質與第一種情形有很大的差別。（註八）

我們往往把自己的願望投射在這個正在演變的中國身上，這樣的例子隨手可得。事實上，不少團體及報章在談論中國的態度和方式上都多少顯示了他們自己的心聲，而並非實實在在地談論中國的處境。倘若我們常常以自己的思想方式來了解事物，我們很懷疑，我們的了解是否真實的了解？中國的新面目表現得較為溫和，但它會使到許多人忘記了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方式、他們的期望和選擇。我們必須真實地去認識一個民族，並且要真誠地愛慕它。

〈四〉認識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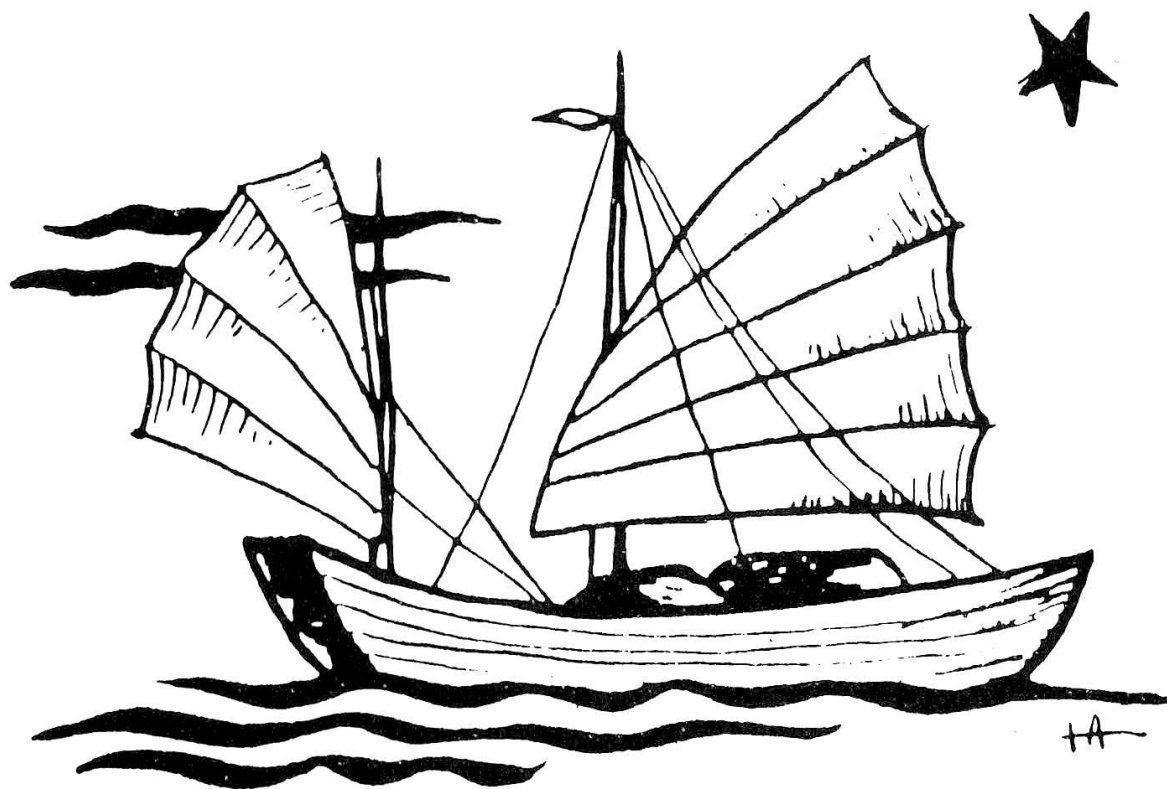
香港的居民並未會真正地認識中國，至少我們可以說，他們尚未熟悉它。他們的認識只流於表面。為此，學者與專家就必須負起研究的責任，有系統地探討大陸生活的各方面——例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宗教。（註九）若果能夠建立一個詳細分析和搜集中國資料的系統，將是很有價值的。它不僅有助於對這個社會主義巨人的深入了解，而且可以協助香港人更好地把握住這個正在劇變中的國家的複雜事實。中小學應設置課程，讓學生較全面性地了解現代中國的近況。電視及大眾傳播工具應讓市民對大陸有更多的認識。在這方面，香港尚有許多工作要做。

雖然中國與香港有上述種種的差距，但在過去數年內，兩地的接觸仍然有積極的因素。到中國的旅遊變成了一種新的人際交往的方式，這些假日的旅遊在許多人心中燃起了感情上之認同，良知的覺醒逐漸產生，不少人終於再發現了自己的「根」。他們很初步地認出了過去多年來所看不見的事實：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香港的居民是地道的中國人。中國不再是禁忌的話題；相反，當談到中國時，人們感到自豪。這些旅遊有一種喚醒的作用，而不只是遊山玩水而已。

第二部份

〈一〉香港與中國的天主教會：（註十）

香港教區在過去的三十年內無法與中國的天主教團體接觸（由於香港有幾個堂區是在中國境內，故香港教會很難與其來往）。而台灣的教區則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中，與香



港教區距離頗遠，所用的語言亦與這塊殖民地迥異。自一九四九年解放後便與香港分離的中國天主教團體，在文革開始時即顯得黯然。這些障礙並沒有影響到香港教區的發展，它進展得相當迅速，每年有很多成人受洗和本地聖召，堂區的善會也很活躍。無論如何，在思想及反省上香港實在經驗到與中國隔離的後果。雖然本地的司鐸做了不少有價值的工作，但在牧民和禮儀上大多數是受外國的影響，神學的成就很弱。公教真理學會的出版大部份是翻譯外國的著作。

香港社會的特徵，不論是優是劣，都可以在教會裡找到。香港和大陸基督徒之間的關係，有光明面，也有陰暗面，但仍然是光明面居多。

〈二〉良知的覺醒：

最近數年來，許多香港的本地司鐸、會士、和教友都曾回鄉探親。藉這些機會，他們與大陸的教會重獲接觸，知道許多人迫切盼望香港教會在靈修及教理上提供幫助。此外，很多從小未能接觸宗教信仰的大陸青年，亦很想知道基督宗教是什麼。一九七四年在比利時魯汶所召開的神學座談會，情形却相反，引起了不少國籍司鐸的關注。（註十一）從此，不斷有文章發表在中、英文的公教刊物上。目前，他們更是公開地談論中國教會及其困難，但三十年前就很少人敢這樣做了。北京主教傅鐵山的祝聖以及教堂的重開，都為無數信徒帶來了問題，對於這些事情，在此不贅。一九七九年的聖召日，香港教區曾印了一張小小的書籤，正

面印着一隻象徵中國的熊貓，背面則印有這樣的說話：「九億中國人力求進步，但只有科技而不顧精神，是真正進步嗎？你願意加入神父行列，為人的真正進步而活嗎？」

為喚起香港人對中國及其教會的問題關注，並為縮短兩地的差距，一位神父和數位基督徒合辦了一份名為「驛」的刊物。香港教區在一九八〇年則成立了聖神研究中心，此中心的主要任務除了搜集資料及出版以外，還聯絡一切從事中國研究的團體及組織。香港教會明瞭到，與新中國建立關係是一項很大的挑戰，但這為履行基督徒的任務却是必需的。利瑪竇研究小組約於同時產生，它主要的目標是聯絡各個與大陸有關的修會團體。香港教會的視野已逐漸擴闊，國內信徒的見證對香港教友的信仰生活具有挑戰的作用。老一輩的教友因目睹大陸教胞的堅貞不屈而感到歡慰；而年青一輩則因發現自己原隸屬於一個更大的家庭而欣悅。教會的共融擴展得更廣更闊，這個事實積極地影響了一般教友團體的生活，使到彼此的來往更頻密、更豐富。

〈三〉善意可嘉但處理失當：

只要環境許可，很多教友都想接觸和援助大陸的教友。雖然多年分袂，但手足之誼猶存，守望相助之情未泯。這是何等動人的事實！但是，當時候來到，要尋找較具體的方法來協助信仰中的弟兄姊妹時，問題便發生。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容易做的恐怕就是分送玫瑰唸珠和苦架給國內的教友，但另一方面却忽略了他們真正的內在需要。

在重逢的喜樂過後，發現兩地的隔閡非常明顯。中國教會的進展落在香港教會之後，對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成就，他們還是初次見聞。由於他們的處境特殊，國內的基督徒感到需要「堅守」多於改變。他們並不感到需要速速實行梵二的措施。可是，有些香港的弟兄姊妹似乎缺少了這方面的基本知識；當與大陸教友分享時，未能充份地說明教會在梵二之前和梵二以後的整個發展過程及其延續性，只是冒失地指出了梵二的改革，又不加以解釋（例如：中文彌撒、合一運動、星期五免守齋……等等），結果，無意中使到大陸的教友覺得自己甚為落後。再者，香港人不僅不批判其物質享受的生活，反而表示支持，這更加深了大陸種種皆落後的感觉。香港人對社會的不義和矛盾視若無睹，對剝削、浪費、和物慾膨脹的情形緘默不言，這是否意味着他們已「久而不聞其臭」？他們批判共產政權比批判殖民地的制度更峻厲。在大陸的同胞面前，他們不欲貶低其聲譽；他們用了兩種不均衡的標準來判斷兩地的現實。由於他們有優越感，故他們往往以「施」和「講」的態度，而非以「受」和「聽」的態度來對待大陸同胞。若如此，香港的基督徒便不能真正地了解到中國各方面的真相，因為，兩地的分享是不平衡的，所以無法達到所期望的效果。

〈四〉對大陸基督徒生活的看法有可商榷之處：

倘若能夠分析所有論及中國教會的文章，是件有趣的事。這些文章大部份環繞着以下的主題來討論：例如：教會的聖統制（主教、司鐸）、教堂、禮儀所用的語言等。這是一個標記，說明強調教會外在結構的看法並非來自梵二的思想。這更是國外基督徒（港澳、外國人

、華僑)自己的看法，而非中國同胞的生活真貌。相反，在梵二的文件發出以前，中國的教友已經與當地人打成一片，作證基督的愛心。「教會是普世救恩的聖事」(註十二)，因此，它必須把基督的工程及其臨在，帶給整個民族。香港的基督徒很關注大陸教友之間的緊張，而這種緊張是由注視教會如何與馬克斯政府打交道而來；雖然如此，我們不應把精力全耗費在這件事上，反而忘記了教會的使命，就是：愛世界上的一切人，並為復活的主作見證。

當香港的天主教徒回鄉返港之後，很少談到基層教友的生活，譬如：在人民公社、工廠、和生產單位的教友的生活。大陸各地教會的生活是很不相同的，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交通不便，另一方面亦由於人們往往沒有真正的分享和交流。若如此，我們提議香港的遊客去關注一些事情，俾能對基層信徒的生活有進一步的認識：例如：注意他們在自己周遭的環境中作證信仰的困難、留意在家庭中的基督徒生活、在公教鄉村中的祈禱生活、以及地方政權對各種宗教現象的態度。雖然，這些教友許多時不懂得去表達自己的信仰，但他們的生活是充滿了恩寵的。香港的旅遊人士應專心聆聽。分享應當是雙方的，只有如此，彼此的相會才能帶來豐碩的效果。

最使香港人感動的事實，是中國的教會在備受各種蹂躪之後，仍然生氣蓬勃。教會的外在組織和結構難望完全復興，但聖神仍舊臨在，基督徒的團體雖然並非如此有形地存在，但它比香港的團體更有活力。這一點能夠引發起一些問題，使香港教會對其生活作有效的反省。事實上，教會生活的「標準」往往是超過一般基督徒所了解的。與大陸的弟兄姊妹接觸，構成一個很好的機會，使我們不斷地質詢自己，謀求進步。可惜，我們尚未能善用這些機會。

更可惜的是人們常常把自己的政治希望投射在中國身上，甚至在教會及在宗教的事情上亦然。什麼是正常化？以何為目標？有些人似乎很清楚地知道中國教會應當走向何方，故此他們汲汲於向人宣示。這些人包括願意外國傳教士重返大陸的、主張支持愛國會的、以及盼望建立神恩性團體的……等等。這些人各懷理想，各走各路。然而，中國教會從來就未曾充份地被人按照它自身的需要愛過。無疑，它急切須要其他地方教會的援助，但這些援助的態度應當是彼此尊重、不自私的、溫和與謹慎的；就如任何朋友的結交，如果他們盼望友誼成長，則必須具備上述的條件。我們又須要認清及接納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教會的處境和未來應當由它的成員自己來處理。(註十三)

〈五〉認識不足：

有些人所認識的中國教會是二十年前的，另外有些人則希望教會符合他們的願望，介於這二者之間，亦有些人很想去認識事實的真相。但這些人又有多少呢？對國內的信徒予以外在的援助亦是需要的，在開始的時候也只能夠這樣做。但是，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也許，在大陸的神父和教友同意下，我們可以做一些牧民反省。香港教會應約束自己，以謙誠的態度去補大陸弟兄姊妹的不足。

香港教友對大陸各種事實的認識顯然是很不足夠，對大陸教會的認識更少。有些天主教

徒和基督教徒已開始工作，企望對中國的基督徒團體有較深入的了解。數份中文雜誌已經出版，表示在認識方面稍有進步，但尚嫌不足。這批積極的信徒，人數很少，而他們的刊物銷路亦不很廣。為能較全面地了解中國，以便更真實地愛慕它，應當有更多的牧職人員及教友投入工作。香港的基督徒不僅需要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而且亦須要不斷地醒覺，對此，香港教會可謂任重道遠。

〈六〉過度敏感：

香港的報章雜誌仍感到不容易去談論中國教會的問題。因為一提到這問題時，情緒的衝動立刻表現出來。（註十四）教宗委任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的事就是一例，這件事在香港的天主教徒當中引起了很大的情緒騷動，在公教報上所發表的爭論，證明過去的創傷尚未痊愈（註十五）。在目前的情況中，我們提議：基督徒可以嘗試客觀地去分析文革後中國天主教會的新處境，並重新考慮他們所採取的立場。隨着鄧主教事件而發生的種種事情，結束了許多對中國教會未來的推敲。或許，目前正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了。為了能夠更客觀地去面對問題，尋求出在目前環境中可行的具體方案，我們必須先讓情緒平靜下來。

〈七〉未來的遠景：

在中國，愛國會人士與非愛國會人士之間的關係僵持不下。當過去的創傷還在痛定思痛的階段，具體地活出基督徒寬恕的訊息是很難的事，這要求時間和很大的愛心。事實上，他們彼此的立場並非如同報章上所描繪的那樣對立。基本的差別是有的，但在公開的言論上很少看見。一方面，愛國會的成員每當發表意見時，都不得不依從某種形式——必須贊同政府，避免表達個人的看法。另一方面，那些不參與愛國會的信徒則趨向於堅守立場，為的能夠保持信念以堅強在信仰中的弟兄。於是，為達到修和，就需要有居間者的出現，化解雙方的恩怨，使其進入交談。香港的信徒是否可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我想是可能的。其實，為了免使人心再遭荼毒，有些基督徒已經努力避免用明顯的說話來論及這種衝突。可是，對於這種明智的保留，有些西方人士立刻認為是「不投入」，其實，這種保留是基於他們相信：只要待以時日，分離的弟兄姊妹始終會彼此寬恕的。喚起香港的教友覺醒到他們的使命是件很重要的事。北京與梵蒂岡的接觸固然重要，但大部份復和的工作可以由基層做起。過去的創傷必須首先復原，新的關係才可建立。若香港的基督徒多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則對中國教會的未來必有貢獻。

現在，許多司鐸和會士都關心中國，他們在會議和刊物上，經常談到它。可是我們必須自問，這種關心是否源自耶穌基督？是否是持久和真正有力的？有些人對中國的關心和興趣是突發的，突然間很心急地想做些事情，這種態度令到人們產生疑問；例如：為何香港教會這樣關心中國？為何它切願與大陸的教會恢復來往？是否它也願意一如商業機構取得中國的市場一樣，向中國教會擴展它的影響力而使到自己顯得更有能力？又或者，剛好相反，是否

它的關心是出於對中國人的愛，以及對基督托付給它的使命忠誠？因此，香港教會應當清楚地表達出它的意向——並非為尋求自我滿足。若如此，它須要接受大陸教友對它的挑戰，又須要有堅定和一致的態度來對待香港社會的物質主義和北京政府的無神馬克斯主義。

福音已植根於中國的土壤裡，只是這株幼苗仍然相當柔弱。雖然如此，它能夠面對馬克斯主義和現代社會的挑戰。它須要接受淨化，面對天主的愚蠢，然而，正如保祿所說，這天主的愚蠢勝於人間的智慧。要達到這點，須要在思想和心態上悔改，我們又是否準備好這樣做呢？在這個社會主義巨人身上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對香港及教會都有影響。現在，中國令到這塊殖民地上的基督徒比從前更確切地認識自己。與大陸不斷的接觸，使到香港的基督徒更清楚他們自己的身份、他們的優缺點。現在就要看香港的信徒如何利用這些機會來革新自己的生活，此亦意味着：我們容納別人在我們的悔改中所扮演的角色。

附註：

註一：在香港方面，政府已經消除了下列的條例：即是：'凡越過新界而沒有被捕，和已進入香港市內的中國移民，均可獲准居留。（一九八〇年十月）此外，香港所有居民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或證件。非法入境者一律被解出境。有些懷孕的年青婦女，則於嬰兒出生後，被遣返大陸，而新生的嬰兒却可留下，因其出生於香港。

註二：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實施禁止非法入境者居留政策之前，香港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如下：

年份	被捕及遣返的人數	逃走及留在港人數	總數
1977	1,800	6,600	8,400
1978	8,200	28,100	36,300
1979	89,900	107,700	197,600
1980（至十月）	80,500	69,500	150,000

註三：在一九七七年，有二百二十萬遊客乘火車到中國。在一九七八年則上升至七百七十萬人。（參閱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八二」）

註四：以下是幾份與中國大陸有關的雜誌：「百姓」、「鏡報」、「七十年代」、「爭鳴」、「真相」。

註五：根據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的香港大公報，中國大陸有一千一百萬戶人家有電視機的設置。

註六：很不幸，中國政府最近嚴格管制這些「魚骨綫」。（見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八日的「明報」，以及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的「南華早報」）

註七：許多文章都談到這個事實，現且列舉數篇如下：

(1)「香港對廣州的偌大影響」（見「香港虎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

(2)「香港的不良影響」（見「南華早報」八一年十二月四日）。

(3)「北京指責海外報刊輸入不健康思想」(見「明報」八一年十二月四日)。

註八：在一篇論到共產黨的行政與四個現代化衝突的文章中，明報的社論評論了香港、星加坡、台灣、以及南韓的情況。根據編者說，這些地方也如同中國一樣，充滿官僚主義、行政紊亂、缺少效率。然而，編者又說：上述各地多少已改善，而中國尚裹足不前。在此文中，標準是很清楚的。

註九：今年，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由三月廿六日至四月十七日，舉辦了一連串與中國有關的座談會，專家的演講和討論使到關心中國的香港人受惠不淺。

註十：對香港的基督教會做類似的研究亦很重要。在此我不提到他們，並非說我對他們不感興趣——我亦深信合一的重要，特別是中國的處境——只是因為我對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的處境沒有足夠的認識，亦因為我必須限定本文所討論的範圍。

註十一：見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英文公教報的「中國神學家座談會」。

註十二：見「教會憲章」第一號。

註十三：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日至九日的滿地可會議中，中國代表之一的趙復三批評：「我們也看到教會中某些人，受過去的影響很深，往往有一種不自覺的以父母自居的思想，有一種優越感；儘管口頭上也可以表示不贊成過去傳教運動的方式，却不自覺地流露出：『我知道你需要什麼比你自已更了解。』『我是你的老師、法官、和救星』。這種思想和基本態度顯然是一種『時代的錯誤』。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督徒眼中看來，這都是殖民主義的殘餘影響。」我們可以同意趙復三的說法。(「驛」一九八二年二月、第廿三期頁廿五英文版)

註十四：這本是一個很小的問題，却在本地的報章上引起了一場爭論。事情是導源於天主教青年聯會要組團上廣州。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英文公教報刊登了陳女士的：「誰是主持人？」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文公教報刊載了唐多明神父的心聲。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東方日報發表了一段新聞：「回穗參加聖誕禮儀，教會人士認為不妥」。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聖神研究中心答覆陳女士。一位名為馮則濟利亞的女士又發表了一函，見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英文公教報。

註十五：見八一年七月十七日的中文公教報，以及後來評論鄧主教事件的各函。